

站长的话

我们的有盖走廊和走道是从五脚基演变而来的。新加坡开埠后，莱佛士拟定了“城市计划”的发展蓝图，规划新加坡河口周边地区的用途和建筑，其中就包括规定店屋的宽度，店屋前必须设五脚基。今天牛车水许多受保留的旧店屋仍保留着五脚基。

根据旧报纸资料库，“有盖走廊”一词最早出现在1970年《南洋商报》“衣食住行在云南园”一文，当中提到大学生在下雨天沿着有盖走廊步行到目的地的校园生活面貌。

上世纪70年代，市区新盖的建筑逐渐建造有盖走廊或走道，将两座相邻的大厦衔接起来，方便上班族。进入80年代，有盖走廊越来越普遍，小学及中学校舍、办公楼、地铁站及巴士站、组屋区镇中心等建造越来越多的有盖走廊。后来的组屋主要翻新及中期翻新工程，给邻里兴建完善的有盖走廊网络。2013年陆路交通发展总蓝图提出总长200公里的有盖走廊，衔接地铁、轻轨、巴士站等；去年9月，当局完成目标。

在一些大国，宽敞的行人广场或绵延数公里的地下购物街是当地特色；在新加坡，绵延的有盖走廊让行人不带伞却不惧风雨。这个简单的建筑设施，足以成为新加坡的特色。

有盖走道也可成为“国家名片”

王传联

如果你只是一个来新加坡玩几天的游客，或者是一个过境新加坡的旅客，你可能不会对遍布全岛、造型各异的有盖走道留下比较深刻印象。但如果你在新加坡待的时间稍微长些，一定会感叹：有它真好啊！

新加坡地处赤道附近，光照强烈，长年如夏，且降雨频繁，所以有盖走道所带来的益处和便利是不言而喻的。对行人来说，只要走在有盖走道下，就无惧烈日和降雨了。

稍加观察可以发现，为了让有盖走道更好地发挥便民利民的作用，很多有盖走道都是和地铁站、巴士站、行人天桥、购物中心、组屋底层及其他建筑的外廊衔接在一起。

前些年，我所居住的这栋组屋

楼下又新建了一条有盖走道，长度虽然不足30米，但把组屋和地铁东西线的高架轨道连接起来。因为这一段地铁高架轨道可以遮雨，形同有盖走道。这样一来，那些行人特别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遇到雨天，根本不必携带雨具，就可以来往于自己家和淡滨尼地铁站、购物中心、巴士转换站等。这一路上只须沿着连接巴士站的有盖走道，越过人行天桥，然后借助与组屋相连接的有盖走道，在组屋楼下一路穿行，四通八达，直接走进回家的电梯。走这么长的距离，居然可以淋不到一点雨，厉害吧？

新加坡在设计建造有盖走道时，除了考虑它的实用性，也会尽量避免外观单一化。有的看上去比较“高大上”，有的相对简易些。尤其是这个“盖”的形状有很多

种，有平、斜、尖、拱顶等，而且在材质和色彩运用方面也是丰富多样，如具有华族特色的、带小尖顶的“琉璃瓦”样式的顶盖。于是乎，这个原本只是用来遮阳挡雨的有盖走道，成了新加坡一道别具热带特色的城市风景线。

对新加坡而言，虽然有盖走道不是那种显山露水、夺人眼球的城市地标，但从侧面体现了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因为建设有盖走道也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支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盖走道几乎已经成为这个城市国家的“基础设施”。

据说新加坡的有盖走道建设，现在又有了新的目标和规划。也许若干年后，随着总里数不断增加，多如毛细血管般的有盖走道和政府组屋一样，很有可能成为一张新的“国家名片”。

希望综合诊所灵活处理病患需要

梁莲湘

我今年78岁，从7月7日开始感到晕眩，7日当天晕眩了三次，8日两次，9日两次。9日下午4时，我到马林百列综合诊所看医生。因为没有预约，看医生的时间订在4时25分。

我在诊室外等候至4时45分，身边已没有其他病患在等候，我敲门

问医生是否可以为我检查。她回答说还有三个病患，要我再等。但外面已经没有人再等候，为何还要我再等？

我看见隔壁的诊室也没有病患在等候，便敲门把我的情况告诉那位医生，她开始时不肯，因为我不是她的病人。

我告诉她我已经头晕三天，担心会晕倒在地上，既然没有病人，

是否可以帮我检查。经我解释后，她说这次破例为我检查，以后不可以这么做。

她为我检查有没有中风的迹象，然后要我改天再到诊所做抽血检查。

我要向那位年轻女医生Lim Shi Wei道谢，并希望诊所在没有病患等候时，允许还未轮到号码的病患让医生先检查。

美国视中国为最危险对手深层原因

唐文方

在当前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下，有些人认为美国换个总统，特别是换个不同政党的总统，矛盾就会缓和。纵观历任美国总统与对华关系的变化，例如克林顿对华“和平演变”的怀柔政策与特朗普的区别，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国内的精英，包括政、商、军、媒、学，无论党派和政治观点的区别，一旦谈到中国，口径就会一致对外，喊出了“中国是美国最危险的对手”，甚至还有人重新提出“文明冲突”的口号。

例如，除了特朗普和他的鹰派行政团队，国会两院中反华调门最高的人之一就是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卢比奥的家庭背景是古巴革命逃到美国的难民，反共的铁杆一向仇视中国，与台独关系密切，去年曾经施压关闭了他所在的佛罗里达州的两所孔子学院，理由是中国政府通过孔子学院向美国渗透。

如果说卢比奥反华是为了支持他的共和党总统特朗普，这还说得过去。但是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政敌，平时和他为了党派利益打得你死我活，一旦面对中国，就会调转枪口，一致对华。例如众议院院长佩洛西是特朗普的死敌，两人还互相对骂对方神经不正常，但每次遇到批评中国，她就会奋勇承担领舞的角色。

另外，美国的媒体也是不分党派地高调反华。上一轮中美贸易谈判无果而终，媒体不分党派全体而攻之，不是批评特朗普要价太高，而是说他要得不够，说他应该对美国的盟友加拿大、墨

西哥、欧盟等妥协，孤立中国，从而抬高对华谈判的筹码。果然，美国随后就宣布减免加拿大的关税。

此外，历来反华的谷歌，最近也积极配合美国政府，试图禁止华为使用安卓系统及其应用程序，目的是阻止华为手机在海外的销售。很多美国的学者前一段时间也不分党派联名发表声明，支持政府的反华立场。

总之，在一个以多元化自居的国家，精英能有如此一致的反华态度，说明中国触动了其根本利益。美国为了什么样的根本利益会对中国如此恐慌呢？

目前最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在经济实力上、技术上和军事上的快速崛起，例如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5G技术、航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铁，以及亚投行、“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等，都彰显了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对美国世界老大地位的影响。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例如中国从韬光养晦变为强势高调让对手不适应，还有人认为是美国在冷战后必须寻找一个新的对手，所以正在崛起的中国撞到了枪口上了。

美国对中国制度的焦虑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并且已经有不少人讨论过，这里我想谈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制度的原因。美国看到了中国快速崛起后面的制度优势，于是对中国产生了更深层次的焦虑。

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美国目前仍然领先中国，但在制度上，虽然美国仍然坚信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但是这

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美国目前仍然领先中国，但在制度上，虽然美国仍然坚信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但是这个制度似乎并没有带来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胜的自信心。

个制度似乎并没有带来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胜的自信心。

美国人对自己制度的自恋，在冷战刚刚结束时达到了高潮，于是有人写了《历史的终结》这本书，以表达西方制度在历史上的胜利。然而，自从冷战结束后，美国制度的弊病也越来越凸显出来。

首先，美国是一个越来越四分五裂的社会，有人形容美国的民主制度不是多数人统治，而是多个少数人利益团体的统治（Polyarchy），而在后工业化社会的美国，少数人的利益越分化越细，且不说女权主义的兴起，各种少数民族团体如非裔、拉丁裔、犹太人、亚裔等等，也在积极争取自己的利益，还要有保护枪支合法性的，也有要禁枪的，有争取堕胎权力的，也有反堕胎的，有要让大麻合法化的，有要同性结婚合法化的，双性人接着也要权利，然后变性人干不了，也要自己的权利。在美国的绝对对政治正确的气氛下，无论你代表什么样的少数人的利益，都有机会分一杯羹。

Polyarchy的结果就是从社会到政府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小团体的利益而寸步不让，造成社会的分裂。总统选举和国会中期选举间隔只有两年，政客为了下选票，就会把上述小团体利益当成竞选口号，例如同性结婚、反堕胎、大麻合法化等等，少有

人关心整个国家的利益，每个小集团利益满足之后，剩下该为国家花的钱和精力恐怕也不多了。

美国高铁始终修不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奥巴马当政时，说要帮笔者当时所在的艾奥瓦州修一条到芝加哥的准高铁，但当时的州长（现任驻华大使）就是不修，原因可能有多种，一个可能是州长竞选时得到当地汽车业的支持，修了高铁等于打脸汽车行业，下次说不定就保不住乌纱帽了。

绝对的人权平等还使社会公平的原则受到了扭曲，比方说，少数民族特别是非裔和拉丁裔，在入学、入职、考核等方面均有成文或不成文的优惠待遇，例如每所大学都会攀比自己有多么照顾非裔和拉丁裔，正常的考核标准不适用于非裔和拉丁裔，致使其他族群的怨气上升，加剧了社会的分裂。

美国近年来的民调显示，民众的政治幸福感下降，对政府、媒体、国会等社会和政治机构的信任度大幅下降。

而中国呢？有一个不须每两年就要为选举疲于奔命的执政党，可以用长远眼光制定战略计划，例如中国制造2025，并且能以举国资源支持这些战略性项目；还有一个获得大多数人支持的政府，所有这些都让美国的精英嫉妒和羡慕。他们深知，中国的潜力根源于其制度，这才是他们最担心的。

中美制度的优劣不是精英说好就

不要在游乐场遛狗

陈新发

最近读到有关居民在儿童游乐场遛狗引发口舌风波的报道，我有话要说。

我平时也会出外遛狗，但坚决反对把狗儿带进游乐场。游乐场是为儿童而设的，让孩子在无拘无束的环境里玩乐，这是他们的小天地，也是各族同胞孩子不分彼此，在一起玩耍、互相认识，从小建立种族和谐的环境。

为何有人要把狗儿带进游乐场？无非为了自己的方便。他们可以一边遛狗，一边看着孩子。我就见过这种情况。

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提到，狗儿不会咬人、不会随地大小便、孩子可以和狗儿接触等。狗儿毕竟是动物，急起来不会告诉主人就自行解决。至于说让孩子接触狗儿，不是每个家长都放心让孩子接触陌生的狗，也不是每个狗主都会让孩子去触摸他们的爱犬。万一发生狗咬人或吓坏狗的事情，后果很麻烦。

儿童游乐场本来就不适合遛狗。游乐场的各种设施是为儿童量身设计的，如果狗儿在那里跑动、追逐或大小便，会对儿童造成不便。如果允许在游乐场遛狗，可以预见女佣或遛狗人放任狗儿在游乐场嬉戏，或把狗儿绑在游乐设施上，狗主在那里闲聊或玩手机，孩子哪里还有玩耍的空间？

真正爱狗的行为，应该是让狗儿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如一起散步、跑步，或者带它们到一些草地，让它们有机会跑动，和主人一起舒展筋骨。这才是两全其美的做法。狗儿绝对不应该和孩子共用游乐场。我们一群爱狗的朋友就是这样遛狗的，狗儿快乐，我们也健康。

总之，游乐场是孩子的天地，我们不能因为一些人的自私而忽略了其他同胞的禁忌。我们应该给孩子保留一个快乐的天地，以及谨记种族间的互相尊重。

是好的，最终的评价应当由生活在每个制度中的老百姓来评价。一个美国学者2017年进行的一项网络民意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和对政府回应百姓需要的认知分别为52%和50%；而在美国，这两项指标分别为可怜的10%和13%。这一巨大的差别不能不说是制度所带来的后果。

有人会说，朝鲜会更高，可那是高压的结果。说这种话的人可能读西方媒体太多了，但是要想证明到底是高压还是真的支持政府，要有可靠的证据，而不能凭拍脑袋想当然乱说。

美国精英对中国的焦虑还在于，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如果运用在其他国家和社会，前者的民意效果也会明显好于后者。再以上述2017年的调查为例，如果用与中国模式很相似的越南，来对比照搬美国模式最好的学生台湾，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和对政府回应度，在越南都是48%，而在台湾则是可怜到惨不忍睹的7%和11%。

不服气的人可能会引用美国制度的各种好处来证明其优越，但如上所说，对任何制度的评价，除了精英对其理想化的描述，生活在其中的民众才是最具有发言权的。精英可能认为中国民众是受了蒙蔽，但是美国民众也会被蒙蔽。无论蒙蔽与否，民众对政府的满意是任何一个政府都想获得的政治资本。

总之，美国对中国的焦虑除了中国经济科技和军力的崛起，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中国在制度上对美国的挑战。如民意调查所显示，这个挑战是客观存在的。相比之下，美国精英似乎对自己的制度越来越缺乏自信。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教授

欧盟领导权之争的经验教训

盟还须加强欧洲议会的作用。

许多欧洲议会议员对欧洲理事会未能提名任何一位“领衔候选人”深感失望，他们可能会投票反对冯德莱恩的任命，从而表达自己的背叛感。如果她的候选人资格被否决，接下来可能会出现长达数月的制度僵局。为了显示诚意，冯德莱恩应该尽早宣称，她将致力于授予欧洲议会议员发起立法的事实性权利。

在与欧洲委员会达成机构间协议后，这种改变将不须对任何创始条约进行修订。此外，如果任命得到确认，冯德莱恩和意大利民主党新任欧洲议会主席萨索利，应该建立一种与其前任容克和舒尔茨同样密切的工作关系。但是，考虑到欧洲议会的新组成人员，他们应该让所有希望为建设一个更强大的欧洲而努力的议会团体的主席都参与进来。

欧洲议会议员选择了萨索利而不是欧洲理事会自己的候选人、前保加利亚总理斯塔尼舍夫（Sergei Stanishev）的这一事实表明，今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已导致人们产生了对制度上自我主张的新渴望。然而，这次选举使得欧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由于绿党、右翼民族主义者和自由派中间派的增加，欧洲人民党和进步社会民主党联盟这两个主要政党，在拥有751个席位的议会中所

占的席位，从404个下降到336个。

欧洲大联盟的衰落和新的较小党派的出现将阻碍决策，正如议会未能就其自身的问题达成一致所表明的那样。议会团体之间的分歧不仅关乎政治，还关乎地理。欧洲人民党几乎没有来自法国或意大利的欧洲议会议员，也没有来自德国和北欧的大型代表团。而进步社会民主党联盟从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所获得的支持要多得多，来自维谢格勒集团（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或法国的议员相对较少。

欧洲议会的日益分化与欧盟成员国之间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法国和德国携手合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而即使他们真的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站在一起”，阻止少数派这一方面也可能成为他们在欧洲理事会的绊脚石。最新一轮的欧盟领导人谈判表明，要想获得多数席位特别困难，更不用说达成一致意见了。

相反，各国政府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则越来越肆无忌惮。因此，个别成员国将面临规模较小、想法相同的团体中追求各自具体目标的强烈诱惑。因此，挑战就在于确保此类举措的实施，要遵循欧盟的官方程序，而不是通过政府间的密室协议来决定。

欧洲议会选举的高投票率表明，欧盟并没有失

去公众的支持。在成员国中欧盟怀疑论者和民族主义政党崛起之际，政治中心得到强化。总体而言，公众对欧盟的信任度与上世纪80年代一样高，当时欧洲一体化是对阵苏联的防御体。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成为欧盟的一员仍然具有意义。

但选举的结果也显示出对变革的期盼。许多公民放弃了传统政党，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恐惧。就像国家层面的政客一样，欧盟的新领导人将不得不就那些对他们和他们后代的未来怀有深深不确定性的选民做出回应。欧洲人对大国竞争、新的安全威胁以及可能颠覆整个经济体系和社会的技术革命感到焦虑，这是可以理解的。

欧盟以及共同工作的各成员国政府合作，须以雄心和决心应对这些挑战。欧洲理事会已经制定2019年至2024年的战略议程，现在该由欧洲议会来做出决定。自5月份的选举以来，来自四个温和派政党的欧洲议会议员，一直在就一项共同的政策重点项目谈判。换言之，他们把政策实质的重要性置于人事组成之上，无论谁担任最高领导人，欧洲议会都将拥有一个共同的平台。尽管规避了“领衔候选人”制度，但这一改变的努力就像理事会选出的一系列有前途的候选人一样，表明欧盟正在缓慢而稳定地走向成熟。

作者Daniela Schwarzer是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
英文原稿：The Lessons of the EU Leadership Fight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9